



第一章

全球传教背景下的土山湾





由于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的改变，19世纪基督教开始进一步推进其全球传教网络布局，而土山湾正是这张全球网络的远东中心。作为天主教在中国进行传教与救灵活动的附属产物，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诞生伊始，即旨在为在江南乃至全国传播天主教教义服务。在其存世的近百年时间里，工艺院陆续开设了印刷、木工、五金、绘画等手工工场，生产了大批的宗教祭祀用品以满足天主教的传教需求，也培养了大批的美术工艺人才。

上海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一定意义上助推了上海工业技术的发展，传入了各种外国商品，其中也包含西方的手工艺生产技术和美术工艺品。土山湾印刷工场还引进并翻译了《造洋漆法》《染色法》《金工教范》等外国工艺技艺的著作，传入的工艺技艺影响较大的有绒绣、抽纱、花边、绣衣、机绣、毛线编织、磨钻和镶嵌首饰等。伴随这些外国工艺品的流入，外国传教士通过教会创办的一些慈善机构开始在上海传授西方工艺品的制作技艺，当时上海的许多社会福利事业组织也开始兴办美术工艺教育和制作的机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出品的彩绘玻璃工艺品、花边、绒绣、印刷的书籍不仅在国内受到热捧，还远销到英、法、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东南亚地区。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出现与基督教全球传教事业及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它既是中国美术工艺史上的独特案例，又是与时代脉搏、文化背景结合的必然果实。其发展脉络，从早期的宗教传播目的逐渐转向与近现代美术、工艺、市场需求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土山湾美术工艺现象。土山湾孤儿院的出现与发展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的创作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工匠精神遥相呼应，而梳理这段消逝的历史有助于对近现代中国美术工艺史、中西美术工艺交流史建立更为立体而生动的认识。



第一节 全球传教与“文化适应”策略发展

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文明的碰撞、传播与交流主要通过探险、军事扩张、贸易和宗教等形式开展。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新航线的开辟，使西欧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进行，给天主教会的神学世界观和封建传统观念以沉重打击，基督教在欧洲的传统地位一再受到挑战。

这一时期，欧洲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天主教内部也开始发生改变，威胁到罗马教廷的绝对地位，罗马教皇所控制的天主教领地日益缩小。为了与新教对抗和扶助教皇，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罗耀拉^①和方济各·沙勿略^②于1534年组织了耶稣会，大力开展普世宣教运动。因此天主教竭力向外发展，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展，传教士的足迹开始进入美洲、亚洲这些古老而陌生的土地，从而弥补宗教改革运动所带来的损失，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作为全球传教的对象之一，当时的中国大体处于晚明崇祯时期到清顺、康、雍时期。黄宗羲^③用“天崩地裂”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国内明清鼎革，历经了满汉政权更迭与文化巨变。世界范围正经随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而来的西方文化与体制在全球的扩张。文化相遇与冲突以多重形式展开，影响深远。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继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次接触。

① 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也是圣人之一。他在罗马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基督新教宗教改革。

② 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西班牙耶稣会士。他协助罗耀拉组织了耶稣会，首先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1552年私自来到今日广东台山市西南海面上的川岛，不久病死该岛。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

③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方济各·沙勿略从日本的传教经历得知亚洲诸国自古以来对“天朝中心”（中国）的文化依赖，加之“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于是，在19世纪天主教全球传教的大背景下，为了在陌生国度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快速、低廉成本地传教，土山湾孤儿院在江南教区建立。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和日本横滨（Yokohama）也建立了类似的集宗教传播、宗教美术工艺品制作、救世济苦目的为一体的孤儿工艺院。虽然从本质上看，建立此类机构的目的在于宗教传播，但它们也从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艺术与文明的对话。

纵览基督教在中国成规模的传教历程，历史上共四个阶段，分别是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和鸦片战争前后的新教。其中，形成比较大规模中西方文化交流，且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来华当属首次。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数量众多，学界已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要对术语进行界定。天主教（Catholicism）和新教（Protestantism）都属于基督教（Christianity），在中国，基督教通常专指新教，又称耶稣教。然而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分歧，这两者在中国的发展往往各行其是。清末民初的这次传教以法国天主教与新教为主，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与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背景交织。

选择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中国天主教教育与经济活动作为评述对象，需交代两方面的背景：一是纵切面的中国天主教史，二是横切面的19世纪以后的中国基督教史。19世纪中国天主教所涉及的主要国际问题包括中法关系、中梵^①关系和法梵关系等。尽管对于法国的保教权^②德国进行过有力的挑战，但总体而言，晚清民初法国在天主教传教史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显而易见。19世纪也是法国在全球殖民扩张的时期，研究基督教全球传教影响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应该具有相应视野。具体到19世纪的中国天主教史，中、法、梵、德等国的互动构成了重要的背景。由于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是由法国耶稣会士主持的机构，因此土山湾研究中涉及的主要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教

① 中梵关系中的“梵”指代梵蒂冈，此处为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有关基督教所涉及的国际问题。

② 保教权：由罗马教廷授予的由世俗政权承担的保护天主教在非天主教国家传播的权利和义务，是天主教传教事业的一种优惠特权。





一派。

从时间线索梳理，明清之际至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华传教并带来了三次重要的东、西方艺术的交汇。第一次是明末万历年间（约为16—18世纪），为此次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也是“西画东渐”的舶来期，该时期以利玛窦^①为中心人物，活动地点基本上在澳门和广州的十三行。第二次是清中期乾隆年间（约为18—19世纪初），艺术交汇的重心则转移到北京，清代康、雍、乾三朝，中心人物是以郎世宁^②为代表的传教士，他们采用了融合中西的绘画技法，这种艺术风格自乾隆时起风靡大约一个世纪，其影响范围仅限于宫廷画院。第三次是在晚清同治年间（约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自利玛窦时代起，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教已呈盛势，明代上海籍的礼部尚书的徐光启^③，就被列为“奉教中有名望之人”之首。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洋文化迅速在中国五大通商口岸传播开来，传教士拉开了向中国人传播西洋美术的闸门，而此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摩擦，并不是从上而下的、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惠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而后又通过融合中西的美术工艺品海外流传，使得东方审美趣味反作用于西方艺术风格。土山湾美术工艺品的创作、流传即为典型案例之一。

这三个阶段各具特点，活动重心分别在澳门、北京和上海三地。如果说前两次是在罗马耶稣会派遣传教士东来的背景下，西洋美术的传播先后出现在民间交流和朝廷画院之中；那么第三次则是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传教士再度来华，西洋美术的渗入则进一步深化为师徒传授的形式。

19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一方面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另

-
- ①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 ②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
- ③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崇祯时期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与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中国基督教的三柱石。



一方面则基本延续了明清以来利玛窦所的“文化适应”策略^①。

第二节 江南教区与天主教远东坐标

江南宗座代牧区^②所称的江南，原是中国一个省的旧名。到1667年开始划分为两个省，江苏省在东，安徽省在西，南接浙江省；西接江西省和湖北省；西北与河南省接壤；北接山东省。江南教区东部分为浦东、浦西、苏州、常州、崇明与海门，教区西部分为镇江、南京、安庆与宁国府。

利玛窦神父及其最初的同事们，为江南天主教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1595年及1599年，利玛窦北上途中，在南京逗留期间做了大量的劝化工作。接替他在南京工作的罗如望神父^③，在1603年劝化了一位朝廷的显赫人物——徐光启，并给他付了洗，取名保禄（Paul）。徐光启引进利玛窦的同会兄弟到上海，他城内的住宅便成了附近地区宗教信仰的发源地。自1688年起，法国遣使会在北京立足，给予在江南传教的耶稣会会士以有益的协助。1720年，法国遣使会神父已在江苏的徐州、无锡、江阴以及安徽的五河等地都有了固定的住院^④。在教务最盛的18世纪初期，江苏已有10万名教友，其中8万名就在上海附近。

然而此后的一段时期对于中国天主教会而言是不幸的，当时由于中国祭祖祭孔的礼仪问题引起传教士之间的争吵和分歧，从而激起了教友们，尤其是读书人和士大夫的愤慨。在50年内，江南教区中除了

① “文化适应”策略是为了服务于基督教全球传教背景下，传教士更好地在传教国开展各式各样的传教活动，把天主教与当地文化习俗结合起来。这种传教策略，可以称之为“文化适应”策略。

② 天主教的一种教务管辖机构，设立于尚不足以达到成立教区资格的传教地区。其本质上是临时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足够数量的天主教徒，从而成立一个正式的教区。

③ 罗如望神父（Jean de Rocha, 1566—1623），号怀中，葡萄牙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派至韶州，万历二十八年至南京。分别于万历三十一年和万历三十二年在北京为翰林徐光启、名望瞿太素施洗。

④ 指提供给神父们每年前来避静及歇夏的建筑。



几位接替南怀仁^①工作的中国神父和来自北京和澳门派遣来的几位遣使会会士接替耶稣会会士外，再也没有其他神父了。主教们采取的最后行动之一，是重新征召并引进了主教区的第一批宗徒们的同会弟兄重来江南，使江南教务从低谷中复兴起来。

1840—1842年当耶稣会被召重来江南时，南京主教区被划归于一位新的署理主教——罗伯济主教^②。教友中各阶层的人都有，而大部分是种稻田的贫苦农民和以船为家的渔民。时局的巨变，迫使传教士们的工作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在南怀仁当时的信件中，他已经为后继者要实现的重要事业制订了远景规划。

早在1843年，罗马教廷就已拟定了方案，欲置中国境内的各个教区于不同国家不同修会的管理之下，但此方案直至咸丰六年（1856）方才正式实施，教廷将刚刚成立的江南宗座代牧区委托给耶稣会巴黎省会。自1856年2月，中方因两起严重事故与英法两国发生矛盾，各方均有损伤。1856年5月，梅德尔神父^③在棘手的情况下上任两大教区会长兼主教的大代权，尊罗马传信部的部令规定：教区的代牧主教即是教区内耶稣会的会长，负有领导管理职权。随后于1864年9月一次主教会议上宣布将原直隶东南区的郎怀仁神父^④调置江南。“太平军苏南之战”期间造成教区的巨额物质损失，教友惨遭杀害。而另一方面，领洗儿童人数增加，圣婴善会的受捐随着教区遭难得加深而变多，且太平军对庙宇、寺院的破坏使道教、佛教遭受打击，此举客观上天主教福音宣传营造了空间，江南教区的传教事业得以发展。自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上海教区一直由法国耶稣会主持。

①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68)，比利时耶稣会士，1656年来中国，曾为钦天监监正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的重要助手，康熙年间受命为钦天监监正。

② 罗伯济，又名罗类思 (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天主教山东宗座代牧区首任主教，天主教南京教区署理主教划归。

③ 梅德尔 (Lemaitre Mathurin, 1815—1863)，法国人，字正心。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到沪传教。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元年（1862）任上海修道院院长。咸丰六年起，任耶稣会江南教区临时会长、代理会长。同治元年六月，署理教区主教。

④ 郎怀仁 (Adrianus Languillat, 1808—1878)，法国耶稣会会士。



根据史式徽^①的《江南传教史》和高龙鞏^②的《江南传教史》记载，土山湾孤儿院初期先后经历了年文思^③主教时期（1856—1862）、郎怀仁主教时期（1864—1878）。1878年5月22日，郎怀仁主教病逝于上海附近的浦东汤家巷小会口内。此时，欧洲的耶稣会已经被解散，其在华工作为遣使会会士所接替，江南教区依然有天主教的活动。上海虽然远离南京、苏州等主要传教活动地点，但在危难之时由于中国神父的协助，逐渐成为天主教活动的主要区域。

综合上述可知，由于1844年中法《黄浦条约》的签订，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取得保教权。他们以此为契机重返中国传教，并将传教的重点放在了江南，而南京和上海便是他们江南传教的首选城市^④。同属江南教区的南京、上海的刻经处在图像传教作品的绘制印刷过程中互通有无，于是才有后文同类作品在金陵刻经处^⑤与土山湾慈母堂同时创作生产的情况。

土山湾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旧地名，大约位于今天的徐汇区漕溪北路和蒲汇塘路的交界处一带。天主教在上海的传入、立足、发展，与明末曾官至礼部尚书的上海人徐光启有直接关系。徐光启于1603年受洗，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如图1-1所示，景教后学良编纂的《徐氏庖言》中收录了描绘徐光启的画像和文字教义。由于徐光启本人及其后代的支持、资助，上海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早拥有信众的地区之

- ① 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iere, 1866—1937），字德甫，法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巴黎大学文学和历史学博士，里昂大学神学博士，英国坎特伯雷天主教修院历史学教授，上海震旦大学世界史教授等。清宣统元年（1909）来华，在徐家汇教堂专事编写《江南传教史》。
- ② 高龙鞏（Aug. M. Colombel, S.J, 1833—1905），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字镐鼎，法国人。同治十一年（1873）筹建徐家汇天文台，同年底建成。创刊《徐家汇天文台观察公报》（法文本，又名《天文月报》）。光绪二年（1876）起，到江苏丹阳、宜兴、崇明、海门、南京等地传教。
- ③ 年文思（André-Pierre Borgniet, 1811—1862），耶稣会士，罗马天主教中国江南代牧区主教（任期：1859—1862）。
- ④ 1847年，江南教区选择水上交通便捷且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徐家汇建造耶稣会会院。1856年1月21日教廷将南京教区改为江南代牧区。
- ⑤ 金陵刻经处为晚清著名学者杨仁山创办。清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移居南京，参与咸丰兵火后的城市建设工作。当时江南久历兵燹，佛教典籍损毁殆尽。杨仁山遂与志同道合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创办了金陵经书处（金陵刻经处前身），经营刻经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把其在延龄巷的住宅六十多间并宅基地六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作为永久刻印经像、收藏经版、流通佛经的庄严场所。出版了《经书八册》《摩诃止观》等经著。



一，而徐光启的家乡徐家汇则成为天主教的重镇。至1644年明亡时，江南约有五万天主教徒，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上海人。



图1-1 《徐氏庖言》封面与内页

左：封面

右：内页——徐光启像

“土山湾”，按上海方言，以韦氏音标拼为“Tou-Se-We”，地处徐家汇地区南缘，1864年耶稣会在此设立孤儿院，后扩展为工艺工场，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工艺的发源地，徐悲鸿曾评价其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徐家汇一直是中国天主教的中心。由于各个国家神父的语言不同，依韦氏拼音汉字注音方式，故土山湾被拼写为T’ou-chan-wan, Tou-Se-We, Tsou-Sè-Wè, Tushanwan。本文遵照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物中官方标注的名称，统一为Tou-Se-We。

出版于1933年的《徐汇纪略》^①是土山湾历史、美术史等相关研

① 《徐汇纪略》：中国籍耶稣会士张璜原纂，介绍徐汇区的天主教机构、文化机构等。



究者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本书。它的引言部分介绍了徐家汇因明末礼部尚书徐光启的墓地及其后人聚居而得名。土山湾在近代受到瞩目和天主教有关，而天主教在上海的传布与徐光启有着密切关系。位于上海徐汇区土山湾孤儿院内的慈母堂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此时育婴堂迁至土山湾已经两年。扩充以后的育婴堂，如徐蔚南在《中国美术工艺》中所述：“育婴堂实即一美术之工场也……堂中工场有印刷、装订、绘画、照相、冶金、细金、木工、木雕、泥塑、玻璃制作等”^①。而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工场不能没有信仰朝圣之地，建立慈母堂就是为了凝聚孤儿们的宗教信仰，相关的职业培训和基督教化活动，也往往围绕着宗教信仰展开。早期土山湾印刷刊行的许多书籍，也大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写上了慈母堂藏版。

此外，在谈到土山湾的建设时，《徐汇纪略》中有这样一句话：“清同治三年，削为平地，土山故地，不复可寻矣。”作者在此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土山消失的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

19世纪中叶，天主教以上海徐家汇土山湾为中心，围圈方圆十几里，逐步形成天主教在华的中心教区。而土山湾孤儿院的发展，既有最初传教士南格禄^②的拓荒之功，也有郎怀仁的特别贡献。1865年3月，郎怀仁到达上海就任江南代牧区主教，一开始曾仿效利玛窦的做法，先到长江沿岸的安庆、南京等地拜会当地官员，结果不但在安庆受到冷落，在南京更是受到李鸿章极不友善的对待。面对巨大的阻力，郎怀仁转而决心针对时弊，从收养弃婴着手在江南扩展天主教的事业。1867年3月，郎怀仁在赴罗马参加庆祝伯多禄、保禄殉道1800周年之际，向教皇汇报了江南教区的新传教策略和土山湾的建设情

① 徐蔚南.中国美术工艺[M].上海:中华书局,1940:163.

另见史式徽《江南传教史》:1867年已有孤儿342人,土山湾孤儿院在原来蔡家湾孤儿学习手艺的基础上,设立了制作宗教用品和印刷宗教经书的工场和印刷所,让12岁的儿童学习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绘画,以及“刻写印刷用的汉字、木版”等手艺。

② 南格禄(Gotteland Claude, 1803—1856), 1842年来华,是重返江南的第一批三位耶稣会士之一(其他两位分别是艾芳济、李秀芳),1841—1848年为江南耶稣会会长。南格禄一到上海,意大利传教士罗伯济主教就留他作为秘书,委为主教代权,成为主教的得力助手。南格禄在任期间,曾阐述过自己的愿景:“上海将是一座满布宗教机构的圣城,并成为全国各省吸取教灵力量的源泉。”耶稣会传教士一贯主张深入中国内地,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耶稣会士才完全确认徐家汇传教中心的地位。





况^①，即由原来利马窦面向达官士人为主的传教，调整为面向大众传教的策略。同年12月又前往巴黎拯亡会，带着第一批拯亡会修女一起回到上海协助传教，而发展土山湾孤儿院的图像印刷事业，可谓配合新策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图文并茂的图书或绘解图像不仅让不识字的人群也能方便地理解教义，而且具有记录往事、领悟义道、昭示教礼一举三得的实效。郎怀仁到上海就任之前，就曾先后担任代理江南耶稣会会长、南京教区副主教，以及直隶东南部和江苏、安徽两省的东南代牧区（南京）首任代牧等职务，所以他在推动上海土山湾图像印刷事业时，能让南京金陵和上海慈母堂之间的雕版印刷互通有无，顺利推进该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土山湾图像印刷事业也吸引了位于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俗称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内的原范廷佐画馆^②，后迁入土山湾工艺院。由于绘画与雕刻本来就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结合画馆优势的土山湾印书馆^③，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此，我们得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成立是基督教全球传教与近代历史交织的产物，此后成为江南教区的中心和远东教区的坐标。与此同时，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兄弟院校——巴黎奥德叶孤儿院（Orphelins Apprentis d'Auteuil）于1866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两所孤儿院几乎同时诞生，性质与运营模式极其相似。可见，创立于中国上海的土山湾孤儿院并非孤例，而是19世纪中叶基督教全球传教进程中建

① 1867年3月，江南宗座代牧区担任主教的郎怀仁在罗马向教宗汇报江南教区的状况，谈及新、旧耶稣会在传教方式的区别时，他说：“首批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开始是向王公大人宣传福音，我们今日，在新形势下，却先向贫穷弱小者宣传了”。郎怀仁离开罗马以后，接着又去了法国巴黎拯亡会，同年底带拯亡会修女来到上海，将她们安置于徐家汇圣母院。在此后几年里，郎怀仁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献堂会贞女训导并管理育婴堂。1869年刻印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玫瑰经图像十五端》很可能就是考虑为圣母堂和育婴堂所用，而育婴堂则很可能同时承担了雕刻和印刷的任务。

② 1850年，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在徐家汇圣依纳爵教堂西南角的耶稣会内设立工作室，也叫画馆，主要用于制作神像和祭坛画，同时以欧洲美术学院教学模式，用石膏素描的方式培训学员。1856年12月31日范廷佐病逝之后，画馆先后由马义谷（Nicolas Massa, 1815—1876，字仲甫）、中国辅理修士陆伯都主持。其教学模式从1860年以后开始突出了机械化培训，即通过打格子将版画作品放大复制成油画。同治六年（1867），画馆迁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内，从此至法国神父范世熙到来之前，由陆伯都和他的学生刘必振主持。

③ 土山湾印书馆是整个“土山湾工艺场”的组成部分，土山湾工艺场设有印刷部、发行所，其印刷部对外称土山湾印书馆。见：张化. 上海宗教通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35.



立的典型机构之一，且这些机构之间也存在往来，促进了东西方宗教艺术的交流。

第三节 传教救灵与孤儿工艺院始末

土山湾孤儿院是1864年法国耶稣会创建的一个宗教慈善机构。它的前身是位于上海青浦的蔡家湾孤儿院。天主教教士薛孔昭^①司铎于清咸丰五年（1855）在青浦县横塘设立横塘孤儿院，继而迁至上海西乡蔡家湾。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至蔡家湾，孤儿房屋被焚，逃生的一部分孤儿遂寄居沪南董家渡。同治三年（1864），迁至沪西徐家汇土山湾，称为土山湾孤儿院。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可知，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出现与圣婴善会的传教目的有关。建院的初衷是收养“救灵”工作中存活下来的弃婴、孤儿。孤儿院后来也收容部分贫儿和贫苦教友家的孩子，日后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天主教文化传播中心。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东方传教与圣婴善会有着密切关联。圣婴善会在1842—1843年间由查尔斯·福尔班·扬松^②主教在巴黎创立，目的是为帮助传统天主教国家中没有信仰的孩子接触信仰。圣婴善会用于资助的财物，是由巴黎总部根据不同教区传教事业的规模大小来提供的。

在圣婴善会成立的时候，耶稣会早已遵传信部的命令而重回江南，第一批传教士在1842年夏天抵达了上海港。很快，他们被上海县城及其周边郊区的大量溺婴和弃婴震撼了。于是他们自担费用去收养弃儿，使其免于溺亡，这也迅速成为耶稣会士在华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最初，神父们把这些弃儿寄养在教友的家里，但几周后，江南教

① 薛孔昭（Luigi Maria Sica, 1814—1895），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青浦横塘发起建立徐家汇圣母院，并于1855年成立横塘孤儿院。

② 查尔斯·福尔班·扬松（Charles de Forbin-Janson, 1785—1844），1860年5月9日，法国南锡教区主教查尔斯·福尔班·扬松创立圣婴善会，发出“儿童必须拯救儿童”的口号。



区的会长卜亦奥^①就认识到，愿意领养孤儿并能够提供必要照顾的家庭数量有限。于是，传教士们主张由教区建立一个大型机构来收容这些孤儿，这也正是土山湾育婴堂出现的原因（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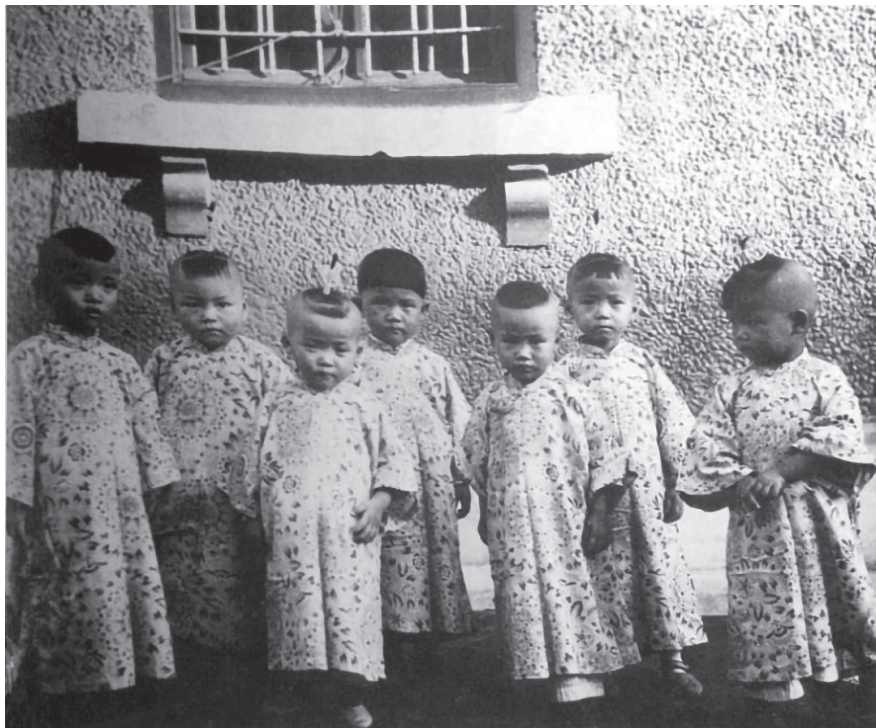


图1-2 土山湾育婴堂的孤儿们

横塘时期。第一个敢于建造大型孤儿院的人是柏葆禄^②，他所设立的孤儿院坐落在松江府的青浦县。同时，南京教区神学院院长施于民神父在离徐家汇不远的横塘堂口建立了南京教区的神学院。在柏葆禄神父去世后，由他建立的孤儿院因无人维持经营而没落，于是没有被教友家庭收养的孩子便转入横塘。

蔡家湾时期。1850年孤儿们从横塘搬到邻近蔡家湾堂口，由方济各会^③主教派遣的菲利希亚（Pellicia）和斯凯蒂诺（Schettino）神父

① 卜亦奥（Auguste Poissemeux，1804—1854），字思懋，法国耶稣会士，1846年来华。

② 柏葆禄（Paul Pacelli，1812—1850），字则理，意大利耶稣会士，1847年来华。

③ 方济各会（意大利文：Ordine francescano）：又称方济会或小兄弟会，或译法兰西斯会，是一个跟随圣方济亚西西教导及灵修方式的修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



照顾他们。如图1-3、图1-4所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旧址以及土山湾在徐家汇地图上的位置。



图1-3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旧址

孤儿院的目的在于把弃儿培养为基督徒，并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父母无法抚养的孩子可以一直在孤儿院生活到20岁；孤儿院给了他们家、坚定的基督信仰以及一定的职业能力；没有被收养的孤儿们，会在他们在孤儿院的最后三年里接受基督信仰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得到一份微薄的收入，以使他们在20岁离开孤儿院之后能够自立。

如图1-5所示，根据现有资料，笔者整理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成立前的几次迁址。

1840—1864年，传教士夏显德^①接手南京教区孤儿院，上任伊始进行了全面改革，在蔡家湾孤儿院开办了四个工场：裁缝间、细木工场、制鞋工场、印刷工场。随后发展出不同部门，包括木工、制鞋、成衣、雕刻、镀金、油漆、纺织及农田耕作，还可以刻写印刷用的汉字和木板，进行刺绣及花边缝纫等工作。迁入土山湾后，又陆续开设了绘画、五金等不同工场共计十几个。1864—1914年，土山湾孤儿院在历任神父所提及的各个工场、车间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开设的。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仅接收男童，而女童则留在圣母院，因此刺

^① 夏显德 (Franciscus Giaquinto, 1819—?)，法国传教士，1849年来中国后不久就奉命代表耶稣会接管南京教区孤儿院。



图1-4 土山湾在徐家汇地图上的位置，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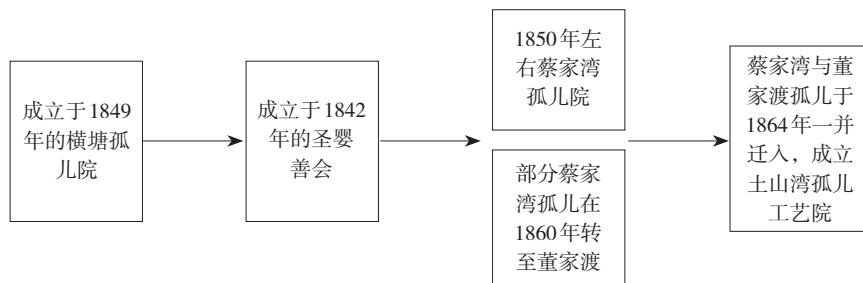


图1-5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正式成立前的几次迁址

绣、花边缝纫等工坊设于圣母院，划分为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洗衣厂。出品的刺绣、花边为当时各界所欢迎，销于海外，为数甚巨。1940年资料反映，当年院中女工达550人之数。关于孤儿工艺院的成立背景、艺术生产、出版传播等，在《土山湾四咏》中可见一斑，如图1-6所示。



1915年土山湾孤儿院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它不仅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有自己的展位，而且其美术工艺品获得了金奖。《百塔图记》(Collection of China's Pagodas) 出版于1915年前后，以纪念和表彰土山湾孤儿院在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当时称“巴拿马万国赛珍会”)中出色的工艺作品以及中国宝塔建筑形式，并写有“1915年巴拿马万国赛珍会土山湾百塔图蒙赠头等奖凭”。

书的扉页则写着“中国百塔由上海附近的徐家汇天主教工业学校为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所创作”(Collection Of China's Pagodas Achieved By The Siccawei Catholic Mission Industrial School Near Shanghai To The World's Panama Pacific Exposition 1915)，使用“徐家汇天主教工业学校”(The Siccawei Catholic Mission Industrial School)一词指代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由此看出，当时徐家汇(Siccawei，该时期徐家汇这一地名拼写为Siccawei，非Zi-Ka-wei)作为天主教远东教区中心已扬名海外。

1949年后，随着中国基督教开始了本土化运动，法国保教权受到打击，传教士纷纷被遣送出国。1955年，龚品梅事件发生后，上海民政局接管土山湾孤儿院，中国教友董贵民担任院长，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不久遂解散。土山湾印刷工场于1958年并入中华印刷厂；土山湾美术工场同年并入上海五华伞厂；土山湾木工工场在解放初期并入五金工场，五金工场在解放后生产过继电器，直到“公私合营”期间与众电器厂合并成立上海继电器厂。土山湾五金工场是土山湾孤儿院最后结束的一个工场，随着继电器厂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搬迁，也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画上了休止符。

土山湾四咏

婴堂

世忍溺婴孩，收恤加栽培，
幼哺兼教读，度量何恢恢。
嗷嘈文字认，嬉笑饱煖该，
居然托夏屋，譬若登春台，
奈何讹谤者，反指为祸胎。





以恩视为怨，市德巫同灾。
吁嗟心不古，孰使愚蒙开。
此情本共白，匪人勿喧豗，
行善有真福，作诗布九垓。

油画

调涂辨五色，深浅古劲装，
长扫逾仗幅，细染极豪芒。
艺精成一业，工食倍相当，
盟心可不昧，对镜时仰望。
修身兼习事，择术此为强。

西报

字母本无多，错综万万亿，
纪事与纂谈，述奇阐教意，
但读华文者，安识纵横记。
界划分黑口，楮光含肃膩，
从今如面词，邦交婉而识。

土山

曾不让泰山，林泉幽且闲，
何烦耸石齿，亦得探烟鬟。
好鸟鸣岩树，凉风生涧湾，
其旁有隐修，悠然闭重关。

——《益闻录》，1891年



沂州府過諸葛武侯故里 ○我本豪狂人狂歌走齊魯沂水流湯湯武侯居此土先生當年生其間避亂隱居於兩陽抱膝常比管與樂為感三顧報劉王綸巾羽扇自風流動業不儘三分謀鞠躬盡瘁敢辭勞小心謹慎為國憂向讀青史服公才公才今古噴噴推更屢先生兵如神出師未捷去不回我過村前瞻真已依稀何處是君里但見村邊三兩家農夫槐下負耜豈其累父復成吟隱隱精彩通吾心茫茫千載有餘悲吊古停驂問水滸○自半程行抵青駝兩阻客館偶成 半程一入皆山路路嶺巖那易度山頭怪石層層露山下亂石盤盤固山坡濃翠藤蘿護山湖流泉鳴瀑布山樓薄暮落日注山寺蕭條鐘聲度山雲不動萬松涼山風吹落瓊花香山僻處少村莊兩三茅屋石作牆驅車復又過長河古木林中現青駝沙明水淨黛於螺飛鳥啾啾結陣多行人歸思疾如梭不期夜雨阻青駝淒淒颯颯打檐牙濁酒孤燈靜不諱故園迢遞隔天涯旅夢懷人是非耶吁嗟乎男兒四海本為家縱教受盡千般苦差勝安居井底蛙○過張夏 涉水登山不記程客中佳句錦囊盈多情更有蟬聲送樹樹黃槐門嫩晴○十二連橋 趙北燕南路一條盈盈綠水望迢遙休云此地無風景壓倒揚州廿四橋 長白馬背船唇客榮椿稿

土山灣四詠○嬰堂 世忍溺嬰孩收恤加栽培幼哺兼教讀度量何恢恢嗷嘈文字認嬉笑飽煖該居然託厦屋管若登春臺奈何訕謗者反指為禍胎以恩視為怨市德誣同災吁嗟心不古孰使愚蒙開此情本共白匪人勿喧逐行善有真福作詩布九垓○油畫 調塗辨五色深淺古勁裝長掃逾丈幅細染極毒芒藝精成一業工食倍相當盟心可不昧對鏡時仰望修身兼習事擇術此為強○西報 字母本無多錯綜萬萬義紀事與纂談述奇聞教意但讀華文者安識縱橫記界劃分黑口楮光含素膩從今如面詞邦交婉而識○土山 曾不讓泰山林泉幽且閒何煩聳石齒亦得探煙鬢好鳥鳴巖樹涼風生澗灣其旁有隱修儉然閉重關 一思先生稿

奏補升調各員記 ○奉督裕帥片奏新民廳同知馬宗武撤任所遺缺請以興京撫民同知徐鏡第署理邊撫民缺請以寬甸縣知縣徐慶璋調署寬甸縣缺請以海城縣知縣陶守愚接署海城縣缺請以現署承德縣准補海龍廳通判金作標署理承德縣缺請以候補知縣榮禧委署奉 硃批吏部知道欽

第十三冊三百二十九

图1-6 收录于《益闻录》中的《土山湾四咏》原稿